師尊之殞落

「道」是古代士人渴望追求的最高理想、價值和真理,此即孔子所謂的「志於道」(見《論語·述而》)。然而要達成這一目標卻不容易,因為「道」對大部份人來說像一個距離很遙遠並且不易到達的聖域,所以曾子說:「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遠」(見《論語·泰伯》)。除了依靠自身剛強的毅力作長期奮鬥外,大多數人還需要老師的輔助才能更接近「道」。儘管老師肩負著「傳道、受業、解惑」(見韓愈〈師說〉)的重責,但當中的一部份卻被橫加白眼。這情況到近來更愈演愈烈,越來越多老師感到自己不被尊重。本文試圖追溯這一現象的歷史淵源,探討歷代統治者如何對待老師,進而闡釋帝師的地位每況愈下這一事實。

老師的地位在先秦時期最高。《禮記·學記》云:「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,當其為尸,則弗臣也;當其為師,則弗臣也。」意即大臣在兩種特殊的情況下可「不臣於君」,其一是臣子在屍祭中擔任祭主的時候,其二則是臣子出任老師的時候。然而老師的尊貴地位在秦始皇統一六國,建立皇帝制度後卻未能延續,因為秦及漢初朝廷不立天子之師。西漢末年復立帝師,據《唐六典》卷一所載:「漢哀、平間,始尊師傅之位在三公上,謂之「上公」,明雖天子必有所師。」太師、太傅和太保作為皇帝的老師,其地位在丞相、太尉等三公之上,可謂位極人臣。由於朝廷對帝師也有極高的要求,「非道德崇重則不居其位,無其人則闕之」,所以在漢魏時期「或廢或置」(均見《唐六典》卷一),由此可見在制度上天子有師傅之美名,但其實則多是尊而不用。到了唐代,太師、太傅和太保這些職位甚少除授,多見用於大臣卒後的贈官,而真正負帝師之責的則是侍讀和侍講學士。侍有承、奉之意,也有陪侍之意,所以不論是侍讀或侍講均是以卑侍尊,為師之尊嚴幾乎蕩然無存。

儘管侍讀和侍講學士僅是五品官員,但有些皇帝對他們的老師仍然畢恭畢敬。據《舊唐書》卷一百二〈馬懷素傳〉記載:「(馬)懷素...深為玄宗所禮,令與左散騎常侍褚无量同為侍讀。每次閤門,則令乘肩輿以進。上居別館,以路遠,則命宮中乘馬,或親自送迎,以申師資之禮。」儘管唐玄宗禮待其師,但他並未有在制度上提高侍讀和侍講的地位。到了宋代,講讀官在經筵為皇帝講課時更需站立,不能像前朝的侍讀和侍講官一樣與君主「坐而論道」。兩宋之際的名臣葉夢得(1077-1148)對這一轉變有深刻的描述,現引錄如下:

國朝經筵講讀官舊皆坐,乾興後始立。蓋仁宗時年尚幼,坐讀不相聞,故起立欲其近爾,後遂為故事。熙甯初,呂申公(呂公著)、王荊公(王安石)為翰林學士,吳沖卿(吳充)知諫院,皆兼侍講,始建議:以為六經言先王之道,講者當賜坐,因請復行故事。...蘇子容(蘇頌)...等以為講讀官曰「侍」,蓋侍天子,非師道也。...申公等議遂格。今講讀官初入,皆坐賜茶,唯當講,官起就案立,講畢復就坐,賜湯而退。侍讀亦如之,蓋乾興之制也。」見《石林燕語》卷一

從上可知講讀官直至宋真宗晚年仍是坐著侍講,直至仁宗初年才因為便 於溝通和指導年幼皇帝的原故才離開坐席和站近天子,而這一立講的模式不單 未因仁宗年歲漸長而改變,反而成為了新的常態。到了神宗初年,呂公著和王安 石等人認為「六經言先王之道,講者當賜坐」,試圖恢復宋初的坐講,但被蘇頌等 人以「侍,蓋侍天子,非師道」為由否決。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講讀官儘管是站著 侍講,但皇帝對其師仍甚具禮數。講讀官到來時,北宋的皇帝會先請其就坐並賜 茶作迎接,且在課堂完結後讓其復坐並賜湯慰勞。相比之下,明代的講官不單是 站立侍講,還需在講畢後跪謝皇帝,「前後皆一拜三叩頭。」《春明夢餘錄》卷9〈文 華殿〉更有甚者,「(景泰)帝每臨講幄, 輒命中官擲金錢於地, 任講官遍拾之, 號恩典。」(見《明史》卷一百五十二〈儀子銘傳〉)講官需俯伏取錢謝恩, 可見其在景泰帝眼中與乞丐無異。帝師之尊嚴淪落至此, 可謂不勝唏嘘。

綜上所述,可知帝師的地位在先秦時期最尊,甚至可不臣於君,但此後卻無以為繼,其品位從西漢晚年王臣之最高位的上公降至唐代與一般「朝臣」無異的侍讀和侍講。其後宋代講官從坐講到立講的轉變,乃至明代皇帝對其師之傲慢態度,均是師道日益不振之明證。帝師尊嚴之殞落,反映了統治者對真理和知識追求的漠視,越發背離知識份子追求的「道」,教育日漸淪為政治的附庸。

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執委

朱銘堅博士



孔子像